



当代中国学术文库
Contemporary China Academic Library

中国古代教育的那些事



刘生龙◎编著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古代教育的那些事/刘生龙编著. —北京: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2012. 10

ISBN 978 - 7 - 5150 - 0494 - 5

I. ①中… II. ①刘… III. ①教育史—中国—古代
IV. ①G52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35121 号

书 名 中国古代教育的那些事

作 者 刘生龙

责任编辑 李旭颖 佟景宸

出版发行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长春桥路 6 号 100089)

(010) 68920640 68929037

<http://cbs.nsa.gov.cn>

编 辑 部 (010) 6892880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6 开

印 张 28

字 数 504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5150 - 0494 - 5/G · 067

定 价 7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调换。联系电话: (010) 68929022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编 中国古代教育	1
中国原始社会教育	/ 3
夏商西周时期教育	/ 5
春秋战国时期教育	/ 9
秦汉时期教育	/ 14
魏晋南北朝时期教育	/ 20
隋唐时期教育	/ 25
宋元明清时期教育	/ 33
第二编 中国古代教育家	45
孔丘	/ 47
孟轲	/ 54
墨翟	/ 58
荀况	/ 63
老子和庄子	/ 67
商鞅和韩非	/ 70
董仲舒	/ 75
王充	/ 78

颜之推	/ 80
郑玄	/ 81
柳宗元	/ 82
胡瑗	/ 84
王安石	/ 85
程颢和程颐	/ 87
张载	/ 90
叶适	/ 91
陆九渊	/ 92
朱熹	/ 93
陈亮	/ 98
王守仁	/ 99
王廷相	/ 101
李贽	/ 102
王夫之	/ 104
黄宗羲	/ 105
朱之瑜	/ 107
颜元	/ 108
戴震	/ 110
刘徽	/ 111
第三编 科举制度	113
古代选士制度	/ 115
科举沿革	/ 119
考试内容及方法	/ 123
明清科举考试的程序	/ 125
文状元浅说	/ 130

武状元刍议	/ 135
榜眼漫谈	/ 162
探花觅踪	/ 167
科举考试制度的再审视	/ 173
科举制——具有世界影响的考试制度	/ 177
科举制百年祭	/ 184
第四编 古代书院	197
我国古代书院制度	/ 199
古代学校的名称	/ 206
古代中央官学(一)——太学	/ 207
古代中央官学(二)——国子监概述	/ 210
稷下学宫兴衰始末	/ 213
白鹿洞书院	/ 217
孔氏家学	/ 221
广府学宫教育	/ 223
宋代书院的兴衰	/ 225
明代书院的四次“灭顶之灾”	/ 233
江西古代的“社学”	/ 236
略论中国古代书院的社会文化功能	/ 238
中国古代专科学校	/ 242
第五编 古代考试	253
乡试	/ 255
会试	/ 256
殿试	/ 257
科举文体的变迁	/ 258

唐代进士科“止试策”考论	/ 260
明代太学中的差遣历事法	/ 277
从北宋经义取士到明清八股文	/ 289
四氏学	/ 292
宋朝科举之外的七种入仕制度	/ 298
明清科举制度的初级考试	/ 300
第六编 古代文举	303
隋代文举概况	/ 305
唐与五代十国文举概况	/ 307
五代十国文举概况	/ 308
辽与西夏文举概况	/ 309
宋代文举概况	/ 309
金代文举概况	/ 310
元代文举概况	/ 311
明代文举概况	/ 312
大西国文举概况	/ 313
清代文举概况	/ 315
太平天国文举概况	/ 316
第七编 古代学官	319
博士	/ 321
明代儒学的教师	/ 322
博士制度与秦朝政治转折	/ 335
我国古代教师的称谓	/ 343
学官的教授头衔	/ 345

第八编 古代教育杂论	349
元代的蒙古族教育	/ 351
明朝及北元时期的蒙古族教育	/ 356
清朝的蒙古族教育	/ 358
中华帝国后期的科举制度	/ 360
清朝末期的教育理念	/ 363
我国古代早期教育思想的现代阐释	/ 376
谈古代朴素的素质教育观念	/ 382
魏晋南朝教师怎样教学生	/ 384
清乾隆后期各省科考舞弊及惩治	/ 387
郑玄对古代学制的研究	/ 389
 附录:古代教育家的教育论述	 392
 历代文举大事记	 412
 历代武举大事记	 423

01

第一编

| 中国古代教育 |

中国原始社会教育

中国早在 100 万年以前，即出现了原始人群；几万年以前，原始人群逐渐过渡到母系氏族公社；5000 多年前，黄河和长江流域的一些氏族开始进入父系氏族公社。中华民族在漫长的没有阶级的原始社会，教育是自然形态的，教育的过程还没有从劳动和生活的实践过程中分化出来，也没有阶级性。生产劳动经验的传授四五十万年以前的北京猿人的考古资料，为研究中国教育的起源提供了较具体的实物依据。北京猿人几十人为一群，居住在北京附近周口店的天然山洞里，靠采集和狩猎生活。他们已能制造多种粗石器，包括刮削器、砍砸器、尖状器等，懂得了用火。根据北京猿人大脑发展的完善程度推断，他们已有了语言。北京猿人就依靠这种劳动经验，以语言为交际工具，结为群体，与自然作斗争，以获取生活资料。他们为了种族的延续和发展，把劳动经验传给下一代，打制和使用石器，利用天然的火等，就成为教育的主要内容。随着劳动技术的不断创新，教育内容和方法也日渐丰富和发展。距今 6000 年左右的西安半坡文化遗存，反映了母系氏族公社繁荣时期的生活图景。这个氏族村落是以农业为主，兼有渔猎、制陶等生产活动。石器已由打制过渡到磨制，出现了光滑、锋利、准确而合乎规格的各种细石器，如斧、镑、凿、刀、铲、纺轮、网坠、箭头等；还有鱼钩、针、锥之类的骨器。最有特色的手工艺是制作陶器。陶器的种类有钵、盆、碗、壶、瓮、罐、甗等，它们既是实用的工具，又是一种艺术创作。像彩陶器上的纹饰：奔驰的鹿、飞翔的鸟、张着大口的鱼、同心扩散的水波，以及人面鱼纹的图案……，既有生动逼真的对自然和生活的描绘，也凝结着人们的想象、宗教观念和对美的感受。制

陶是一种专门工艺，一般是由有经验的妇女掌握。年轻一代学习这种技术，由这些成人有目的有意识地给予指导。古书记载：“（燧人）钻木燧取火，教民熟食”（《白虎通》卷一）。“燧人之世，天下多水，故教民以渔”（《尸子》）。“神农耕而作陶”（《太平御览》引《周书》佚文）。“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白虎通》卷一）。这些传说，从内容看，所反映的正是远古从原始人群到进入母系氏族公社之后的生产和教育的历史。关于父系氏族公社时期创制发明的传说，愈加丰富，而且集中在黄帝（部落联盟的首领）的身上，如：“黄帝作宫室，以避寒温”（《初学记》卷二十四引《白虎通》佚文）。“黄帝见百物，始穿井”（《初学记》卷七）。“黄帝作车，引重致远”（《古史考》）。“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史记·封禅书》）。“黄帝作弩”（《古史考》）。“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史记·五帝本纪》）。“黄帝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衷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吕，大桡作甲子，隶首作算数，容成综此六术而著遍历也”（《史记·历书》索隐引《系本》）。这类传说，虽不能据为信史，但总的来看，是反映原始社会末期，生产技术和文化有了多方面的进展，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教育的内容。尤其引人注意的是：武器的制作和作战的训练成了教育的新课题。道德习俗教育教育的职能不仅是劳动力的再生产，而且是“社会人”的再生产。原始社会每个人也是以社会一员的资格，同其他社会成员协力，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事生产劳动的。所以，以巩固原始社会生产关系为基本目的的道德习俗教育在当时也是存在的。原始社会时期，一般说来，还没有形成明确的道德标准，道德观念即体现于风俗习惯之中。那时候的道德习俗教育也是在劳动和生活实践中进行的。图腾崇拜（在中国影响最广的是龙、凤图腾）以及由此派生的歌舞和神话故事（如女娲补天、精卫填海之类），是氏族形成以后进行道德习俗教育的重要形式，它们有助于增强氏族共同体的观念，激励人们为集体利益而献身。学校的萌芽《礼记·明堂位》记：“米廩，有虞氏（舜）之庠也。”“庠”为学校

名，本义为“养”，即把有道德、有经验的老人养在那里，专门从事教育工作。原始社会末期，开始出现了劳动产品的剩余，少数人得以在别人劳动产品的供养下主要从事教育工作，因而产生了近似学校的教育场所，这是合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

夏商西周时期教育

公元前 22、21 世纪，中国进入了奴隶社会，经过夏、商、西周三代，历时一千六七百年。随着阶级对立的形成和发展，教育也有了阶级性。奴隶主贵族为培养自己的子弟，建立了学校。奴隶和平民则不同程度地处于被统治的地位，只能在劳动和实际生活过程中受自然形态的教育。夏代（约公元前 22、21 世纪～前 17 世纪）教育的传说《孟子》记：夏、商、周“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礼记·明堂位》又说夏代的学校曰“序”。这说明夏代已有进行伦理教育和军事训练的学校，但还没有从出土的文物中得到证实。商代（约公元前 17 世纪～前 11 世纪）教育概况考察商代的教育，不仅有历史文献为根据，而殷墟出土的大量甲骨文字更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商代学校见于文献者，除《孟子》所记的“序”与“学”，《礼记·明堂位》又有“瞽宗，殷学也”的记载。汉人注解，瞽宗本是乐人的宗庙，因成为学乐的场所。甲骨文尚未发现“序”及“瞽宗”，但“教”与“学”则屡见，如：“丙子卜，多子其学，版不大雨？”（《龟甲兽骨文字》卷二第 25 页第 9 片）。这片卜辞是说，丙子日卜问上帝：子弟们上学回来，会不会碰上大雨？“乎多伊于教王族”（《殷虚书契前编》第五卷第 8 页第 1 片）。这片卜辞的内容是：商

王命令伊（官名）认真负责地教育王族成员。“丁酉卜，其呼以多方小子小臣，其教戒”（《殷契粹编》第114页第1162片）。“戒”字原，像人手持戈，本意可有二说：一是持戈而警戒，一是持戈而舞蹈（据陈梦家《射与郊》，载《清华学报》第13卷第1期，1941年4月）。“教戒”盖兼指习武与习舞，与殷序习射、瞽宗习乐之说相吻合。“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习武是为了征战，习乐是为了祭祀，正反映奴隶制国家统治的需要。《殷契粹编》书影（郭沫若）甲骨文字还表明商代已进行读、写、算教学。出土的甲骨文单字已达3500个左右，形声、会意、假借等进步的方法已普遍使用，这说明商代文字的发展已很成熟。自然会出现长篇文字记录。《尚书·多士》说：“惟殷先人，有典有册。”甲骨文有“册”字，像许多书写材料穿在一起。由此可以推测当时已具有进行读书、写字教学的需要和条件。有一个骨片上有五行字，重复地刻着从甲子到癸丑十天的干支表。其中一行字迹特别工整，大概是教师所刻的范本。其余四行则歪斜不齐，显然是初学者的习刻。这个骨片是文字教学遗存的实物（郭沫若《殷契粹编考释》第1468片）。商代在天文历法方面已有很大进步，它们都与数学的发展有关。甲骨文中的数字最大已达3万（《殷契粹编》第1171片）。出土文物还表明，那时已能进行一般的算术运算，并能绘制比较复杂的几何图形，所以数学也成为教学的内容。由上述的材料可以看出，商代贵族很重视教育，设立了贵族学校，教师是由国家职官担任，教育的内容包括宗教、伦理、军事和一般文化知识。这就是中国最早的官学的雏形。西周（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官学制度的发展和六艺教育的形成西周已是中国奴隶社会发展到全盛的时期。它继承商代的教育制度，建立了典型的政教合一的奴隶制官学体系，形成了居于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六艺教育。据《礼记》、《周礼》等文献记载，西周官学已有“国学”与“乡学”之分。国学设在王城和诸侯国都，分小学与大学两级；小学在城内宫廷中，大学在南郊；王城的大学称为辟雍，诸侯国的大学称为泮宫。辟雍又分五学：居中者即以辟雍命名，也称太学；南面的曰成均，也称南

学；北面的曰上庠，也称北学；东面的曰东序，也称东胶或东学；西面的曰瞽宗，也称西雍或西学（据黄以周《礼书通故》及孙诒让《周礼正义》）。乡学则按地方行政系统，州设序，党设庠，闾里设塾或校。乡学的优秀生可以升入国学。国学教育对象限于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嫡子，以及经过选拔的“国之俊秀”（乡学教育的对象，史无明文）。入学年龄也有规定，但诸书记载不一致，说8岁入小学、15岁入大学者居多；也有说13岁入小学、20岁入大学，或15岁入小学、18岁入大学的。青铜器上迄未发现关于乡学的明确记录，但已有关于辟雍与小学的记述。结合金文考察西周教育制度的演变，可以看出，西周初期的学校，是以习武为主，教师可能是由军官担任，“师”这个词即源于军旅和军官的称号，如王宫小学教师“师氏”即是担任王宫警卫的高级军官。辟雍和泮宫原是厅堂式的建筑，四面敞开，没有墙，主要为习射之地，故又名“射宫”。建筑物四周有水泽环绕，故亦称“泽宫”。水泽外面是森林。贵族子弟即在水泽中射鱼射鸟，在森林中驱车围攻野兽。《尚书大传》说：“战斗不可不习，故于搜狩以闲之也。”辟雍中的渔猎活动，是一种实战训练。周康王时的《麦尊》记：“在辟雍，王乘于舟为大丰，王射大（鸿）禽。”周恭王时的《师汤父鼎》记：“王在周新宫，在射卢。王乎宰雁锡卢弓、象弭矢、彤（为箭为栝）。”上引铭文记周王亲临学宫，率群臣及贵族子弟在辟雍演习射箭，成绩优良者给予奖赏。“大池”、“学宫”、“射卢”皆指辟雍而言。这些器制作的时期虽去西周建国已历数世，但铭文反映出大学中仍保持着尚武之风。辟雍和泮宫亦如宫廷，贵族们常在这里举行祭祀、宴会，选拔武士，议定作战计划。打了胜仗，就到这里“献俘”、“告功”。西周中期，政局趋向稳定，经济和文化获得空前的发展。教育方面逐渐增加政治、伦理的内容，要求提高文化教养的水平，形成了以礼乐为中心的文武兼备的六艺教育。六艺由六门课程组成：①礼：包括政治、历史和以“孝”为根本的伦理道德教育。②乐：属于综合艺术，包括音乐、诗歌和舞蹈。③射。④御：以射箭、驾兵车为主的军事技术训练。⑤书。⑥数：包括读、

写、算基础文化课。六艺之中，礼、乐、射、御为大艺，主要在大学阶段学习；书、数为小艺，主要在小学阶段学习。礼、乐代表奴隶主阶级的意识形态，是决定教育的贵族性质的因素。乐的作用主要是配合礼进行伦理道德教育，礼重在约束外表的行为，乐重在调和内在的情感。射、御也渗透着礼、乐教育。《礼记·射义》记：“诸侯岁献贡士于天子，天子试之于射宫。其客体比于礼，其节比于乐，而中多者，得与于祭。其客体不比于礼，其节不比于乐，而中少者，不得与于祭。”说明评定射艺也离不开礼的准则。书、数是学习礼乐的基础和条件。传说当时的识字课本有《史籀篇》，数学课本有《周髀算经》，惟其详不可考。《礼记·内则》载有西周实施“六艺”教育的过程。婴儿到能自己拿东西吃时，即教以使用右手。能说话时，教以应诺，男答“唯”，女答“俞”。盛佩巾的袋子，男用革，女用丝。6岁，教以简单的数字和东南西北等方位的名称。7岁，教以男女有别，不同席，不共食。8岁，开始教以礼让，出入门户及入席饮食，必后于长者。9岁，教以朔望和日数。10岁开始，男孩住宿于外，就学于老师，学习书写和计算。此时不得著丝质短衣和套裤。朝夕学习幼儿的礼节和书写的篇章以及应对的语言。13岁，学乐，诵诗，舞勺（文舞）。15岁为成童，舞象（武舞），学射、御。20岁，行冠礼，开始学习成人的礼仪。此时可以著丝质衣服及皮衣，行孝悌，博学而不为人师。30岁，娶妻，始理“男事”。女子10岁以后，即不出闺门，婉顺听从傅姆的教导，学习烹饪、缝纫、纺织、编结等“女事”，观看祭祀，学习奉献祭品及助奠仪节。这个教育过程包括了从学前期到学校教育阶段教育实施的步骤和基本内容：同时反映出在男尊女卑的社会制度下，女子完全被排斥在学校教育之外。随着六艺教育的形成和文化课程的加强与提高，教师多改由文官担任。见于《周礼》、《礼记》的西周教官如大司乐、大乐正、小乐正、大师、小师、大胥、小胥、执礼者、典书者等等，大都是不同等级的典司礼乐的职官。与这种变化相应，大学也由兵营式的建筑演变为四合院，出现了整齐对称的课堂。所谓辟雍“五学”种种不同的名称，可能就是这些

课堂的命名。西周在科学技术方面，如天文、历法、医药、建筑、冶炼、机械制造等，都有很大的进展，但贵族们奉行的原则是“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认为学习这类东西是同高等贵族的身份不相称的，所以学校中并不重视科技教育。科技的传授是通过另外的渠道，由专门事务官祝、史、医、卜及“百工”，父以传子，世代相继，成为“世业”。学校教育 with “世业”并行，是中国古代教育制度的又一特点。西周晚期，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开始动摇。到了春秋，封建经济的因素不断发展，周天子失去“共主”的地位，贵族中的一部分向封建地主转化，士阶层兴起，贵族官学日即衰废，代之而起的是私人自由讲学，由此而展开中国古代教育的新局面。

春秋战国时期教育

这一时期（公元前 770 ~ 前 221）是中国奴隶制社会解体和封建制社会形成的时代。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进入官学衰废，私学兴起的新时期。西周末年，奴隶主贵族的官学已经形同虚设，昔日庄严神圣的官学出现了学生无心读书，整天游荡嬉戏的局面。这是奴隶主贵族垄断的“学在官府”日趋没落的反映。到了春秋时期，连虚设的官学也几乎不存在了。古史资料关于春秋时期官学的记载只有两条：一条是《诗·鲁颂·泮水》中曾提到鲁僖公立“泮宫”；另一条是《左传》襄公三十一年传记说郑子产“不毁乡校”。当时有些诸侯公开地说：“可以无学，无学不害。”（《左传·昭公十八年》）这不仅是因为奴隶主贵族不可能再垄断学校；同时，也是由于奴隶主贵族学校不符合新兴地主阶级的要求，因而官学必然地要衰废。春秋中期以后，诸侯国势力的强大，迫使周天子失去了“共主”的

地位，新兴的地主阶级在各诸侯国中逐步取得了政权，这些是奴隶制官学衰废的历史背景；而“士”的出现，则是私学兴起，造成“文化下移”的社会基础。士阶层的形成及私学的兴起“士”，是春秋时期新出现的社会阶层。士阶层中有文士、武士，也有能文能武之士。士最初是从奴隶主贵族游离出来的，有一些是属于平民阶级，也有一些是属于新兴地主阶级，以及获得解放的奴隶上升为士的。周平王东迁时，王宫里的一些文化官吏流落到各地。周王室在公元前675年、前635年和前516年，先后发生了争王位事件。世代掌管周史的司马氏流落到晋国，以后又分散到卫、赵、秦诸国。还有一部分文化官吏和百工，带着宫廷的典籍逃亡到楚国。《论语·微子》记载了周天子宫廷中掌管礼乐的官吏纷纷出走的情况：大乐师挚到齐国，二乐师干去楚国，三乐师缭到蔡国，四乐师缺去秦国，打鼓的方叔流落到黄河之滨，摇小鼓的武人居汉水附近，少师阳和击磬的襄移居于海边。这些文化官吏由于失去了世袭的职守，流落于社会之后，成了历史上第一批专靠出卖知识糊口的士。据有的人分析，其中有些人可能做了私学的教师。在社会阶级关系不断分化集结的过程中，士阶层有了新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奴隶主贵族统治者或新兴地主阶级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争先招贤纳士。当时，士在行动上有一定的自由，士无定主，因而成了统治者竞相争取的对象。春秋初期，出现了养士之风，如《国语·齐语》中说，齐桓公养游士80人；“季孙养孔子之徒，所朝服与坐者以十数。”（《韩非子·外储说左下》）到了战国时期，“养士”之风就更为盛行，诸侯国君，如秦穆公、魏文侯、齐威王、齐宣王、梁惠王、燕昭王都一度为士众所归。尤其是齐威王和宣王建筑了高门大屋的稷下学宫，“招致贤人而尊崇之”。《史记·田齐世家》中记载：“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随着阶级斗争的深入，士阶层中有些人抱残守缺，墨守成训，有些人则转变成为了批判旧奴隶制、批判旧文化的思想先驱。士阶层产生、发展和分化